

政府信任，需要制度化的不信任为伴

□ 卢阳旭

在SARS十周年之际，H7N9，一种新的病毒，正在袭击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病毒扩散，也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恐慌。一方面，目前还没有发现H7N9病毒人际间传播的证据；另一方面，政府在应对此次事件过程中，保持了相对较高的透明度，能较为及时地回应公众的忧虑和质疑。

比较政府对SARS和H7N9不同反应带来的社会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处理公共卫生事件等紧急情况时，保持政府公信力至关重要。

当威胁人们健康和安全的疫情（或其他紧急事件）发生时，本能的焦虑会使人们对相关信息的需求急剧增加，对任何相关的信息都会极度敏感。与此同时，发达的媒体技术便利了信息的传播。不同来源、

相互矛盾的信息，都可借助新的传播渠道快速传播。信息量和信息的异质性都会急剧升高。

及时发布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很重要。更关键的是，要让公众感觉到政府发布信息，不是临时的应急之策，而是一种制度性的要求，是一种可预期的行为。

但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第一，多年来由有的地方政府在处理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上的作为瑕疵，使得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受到很大损害。第二，虽然信任和信任可以相互转换，但信任转化为不信任比不信任转化为信任容易。换句话说，信任，破坏起来很容易，建立起来却很难。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建立在政府行为的可预期性和对政府失信行为惩罚的有效性

基础之上。事实上，政府设立之初，人们就非常担心政府滥用权力，成为一个不受控制的“利维坦”。为政府权力设立一道道挡水墙，也就成为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设计的核心关注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的公信力是在回应、消除公众的质疑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设定严格的决策、执行和问责程序，设立各种内外部审计和监督制度，都是为了公众对政府的行为、特别是行为的边界和方式形成稳定预期。事实证明，这些制度化的不信任机制，不仅不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反而会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如果把信任和信任当作一对对手的话，那么，培养制度化的不信任这个竞争对手，是增强政府信任韧度的好办法。

将不信任制度化，意味着不信任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制度行为；意味着不信任者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强的能力去质疑、去验证。这种制度压力在促进政府更好地工作的同时，也能让公众相信政府有自我纠错能力，进而对政府有更多的耐心和信任。

制度化的不信任，为公众中可能存在的信任提供了制度化的表达渠道，降低或消除不信任在制度之外聚集，并对制度形成冲击的压力。与此同时，在一个把不信任制度化了的制度系统中，也能更好地制约不信任的蔓延，防止人们将其正当的不信任推向极端。换句话说，一个有效的制度，需要为制度化的不信任留有足够的空间和余地，以此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图/CFP 刘国伟

又拿申遗来“做”事

□ 杨雪

近日，理有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的西安兴教寺拆迁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真相莫辨。又是拆！只不过这次“拆”的大戏没盖在寻常百姓家，而是一记大印落在“唐僧”埋骨所在的千年古刹。又是西安！一个山寨阿房宫刚以闹剧收场，这又打上了兴教寺的主意。西安啊，我出生的地方，一座历经沧桑的城，一座遍地文物的城，历史赋予你无与伦比的底蕴，你却如此不“自重”，让我情何以堪！

无助的民意将情感托付给舆论，在微信上喊话给大师兄：“师傅摊上大事了”。舆论的推波助澜，让“有关部门”不得不直面公众的质疑，作出并不能服众的解释。前后的说法，并不那么一致；当中的细节，经不起推敲。千言万语，都在试图说明：“我们是尊重僧人的，我们也不准备搞商业合作，我们的目的很单纯，我们只想申遗。”

申遗原本是件单纯的好事，能够加强对自然和人文遗产的保护，同时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听起来公共性很强，公

众参与性也很强。然而，看看这些年，伴随着申遗成功，我们首先能参与其中的，大概就是要多掏钱，才能亲近这些宝贵的、人类共同的世界文化遗产。

福建土楼申遗成功不到一年，门票涨了3倍；平遥古城的门票收入，申遗前一年是82万元，申遗后一年就变成了800万元；还有九寨沟、黄龙、丽江古城、敦煌莫高窟等等，无一例外地在申遗之后身价暴涨。

可见，申遗不仅是一件单纯的好事，还是一件复杂的好事。不仅增加财政收入，还能为地方政府创造政绩。一举数得，冠冕堂皇，当然争先恐后。所以，拆，或者不拆，动土都有GDP；招商引资，或者“单纯”申遗，背后都有利益驱动。

退一万步，既没有话语权又微不足道的我们，怎么说都共同贡献了申遗所带动的经济效益。那么我们希望，这些贡献，能够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保护和传承自然和人文遗产的保护。仅仅是希望，也仅仅是相当一部分，不奢望全部。

更好地发挥科学家群体的公信力优势

□ 赵延东

最近上海等地出现H7N9禽流感病例，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这不禁让人回想起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各地的“抢盐”风潮、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公众的心理恐慌……在这些突发事件中，除了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之外，当前中国社会还迫切需要有一个有较高公信力的社会群体，在事件发生后与公众及时沟通，稳定社会心态，化解不良影响。从现实情况看，科学家群体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这一重任。

现代社会中，人们高度依赖以科学家为代表的“专家系统”，对科学家的信任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之一。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各种突发事件时有发生。科学素养不足的广大公众往往在涉及科技问题的事件中产生种种疑惑和迷茫。这些都在客观上要求科学家在公共

危机事件中承担起社会责任，答疑解惑，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客观地面对和处理危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我国公众对科学家群体有着较高的信任水平。据中国科协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公众认为诚实守信的社会群体中，科学家排在第一位，工程师排在第二位，他们是目前我国社会公众最为信任的社会群体，这一公信力优势已经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得到了体现。

但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科学家对公共事件的参与程度还有待提高，在许多危机事件发生后，科学家常常保持着不应有的沉默。为进一步发挥科学家的公信力优势，使其在突发事件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政府、科学家和社会都应有所作为。

从政府部门看，应将科学家纳入公共

危机事件应急响应系统，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科学家群体发挥专业技能，积极参与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工作。同时，要特别注意减少行政干预，保证科学家相对独立和客观的角色。

从科学家群体自身看，首先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突发事件管理。其次，应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公正、客观、规范、严谨，不宜跨越专业范围信口开河，更不能掺杂私利为利益集团代言。

从媒体的角度看，应逐步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科学传媒队伍，在科学家和公众之间搭建起有效沟通的桥梁。

从公众的角度看，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在全社会建立一个科学、理性、宽容的社会氛围，共同为科学家参与公共危机事件管理打造良好的舆论和社会环境。

“凳矮矮”凸显公共服务意识矮化

□ 吴玲

“一张公交候车长凳，高不足20厘米，真不知道是让人坐的，还是绊人脚的，这样的凳子还不如不建。”近日，广西南宁市民抱怨公交候车凳矮，原本为民服务的公共设施不便民，是建设之初的“应付了事”，还是后期管理的“不闻不问”？（4月7日《城市晚报》）

候车凳本是方便市民的公共设施，然而这种“坐着像蹲着”，坐着不如站着的“龟背、油条、光棍……”的“凳矮矮”究竟是方便市民还是刁难市民，考验市民？市民没有得到方便，累的时候想休息一下，却是腰酸腿酸地难受极了，有人甚至经常被“凳矮矮”绊倒。这样的方便凳不便民还要他干嘛？

上海扑杀11万只羽活禽；南京“全城杀鸡”；连并非“灾区”的广东肇庆，肉鸡养殖户也迫于成本压力活埋了12万羽乳鸽……自H7N9“禽流感”爆发以来，各地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及时阻断传播链条，控制疫情蔓延。“扑杀疫区3公里之内”的活禽，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但早在南京杀鸡之时，就有环境学者指出，鸡只是病毒的一种寄主，“人类永远无法消灭禽流感病毒，病毒将与人类共存亡”。言下之意，病毒寄主何止千万，倘若都以“扑杀”的方式来解决，那人类将永无宁日；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作为生态链上的一环，屡屡向其物种举刀，意味着自行割断食物链，其他果堪忧。

自1878年最早在意大利发现禽流感以来，人类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面临这种病毒变种的骚扰。一方面，有学者呼吁坦

然应对。动物传染病有200余种，其中半数以上可传染给人类，不是这种病毒爆发，就可能是那种病袭来。以往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恶如花、鼠疫，也最终被人类制服。今天的H7N9禽流感跟那些传染病相比，毒性和传染性都轻得多，加上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丰富经验，公众大可坦然面对。

但另一方面，以往的统计资料显示，禽流感的流行也是人类不当行为积累的无妄之灾。20世纪以来的亚洲是这种疾病发生的重灾区。1997年至今，全世界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死亡的患者中，近一半出现在亚洲国家，其重要原因在相对落后、无序的养殖方式：脏乱差，过于密集的生长环境；为促生长，无节制地给家禽注射各种激素；或者完全没有免疫措施，生长过程又无法避免与传染源接触。对利益的贪婪和对禽类

病毒袭来的“警告”

□ 谈琳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人类不是存在的主人，而是看护存在的牧人，只有反对一切以人类为中心才会使人更有人性，更有理性。在人类面前禽类的弱小而易见，但我们也不能视禽类如草芥。疫情袭来应当视为动物们对人类发出的“警告”，只有铲除这些病毒产生的条件，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终极之道。

生存条件的漠视，成为病毒滋生的温床。此外，与以往所有变种相比，H7N9禽流感一个被广泛忽视的特点在于，这种病毒在禽类身上不会表现出症状，而一旦传染给人就有致命的危险。对这一特点的茫然无知使很多人深陷险境。随着疫情发展，很多养殖户不堪重负，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条件下自行处理禽类……倘若被处理的这些禽类中已有病毒携带者，将会怎样？

我们并不否认，在名校的面试中，有不少既有新意又能考察出考生思维水平的好题目。可是，那些“雷人”的“神题”绝非个别。诸如馒头和包子打架你怎么看之类的题目，不少考生在考场上产生一种无力感。有的题目甚至涉及外星人：如果外星人来地球会带走（来）什么？

在今年自主招生“神题”事件中，“神题”本身及媒体对于它们的“个性化”报道，均有“可圈可点”之处。

从“神题”面试来讲，试题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着实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试原本是一种考核学生综合能力的方式，以期为高校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象蚂蚁大战、成语这样的题目能考出什么样的水平？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题目是要选拔什么样的考生？为了能顺利通过这样的面试，考生是否需要参考诸如《脑筋急转弯三百题》之类的书籍？这样出位的题目

“神题”面试并非娱乐新闻

□ 吴佳坤

自然为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埋下了伏笔。此外，媒体不当的炒作也迎合了受众的猎奇心理。在不少网站上，充斥着网编对于各类火爆“神题”的详细盘点和评论。有些媒体“标题党”的做法更是将此类新闻并化成娱乐新闻。北大的一道题考察了对于生命在于运动和千年王八万年龟的理解，却被某网站冠以《搞不懂乌龟王八 你难进北大》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新闻标题只是选取了原题中刺激人眼的元素，与原题呈现出明显的偏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于教育的不信任感。众多的“标题党”，使得受众再一次陷入娱乐化的消费狂欢之中。

选拔既然是自主性的，那么就应当放手让高校去做，旁观者不宜多管闲事。面试关系到考生的前途，原本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均有“可圈可点”之处。

从“神题”面试来讲，试题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着实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试原本是一种考核学生综合能力的方式，以期为高校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象蚂蚁大战、成语这样的题目能考出什么样的水平？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题目是要选拔什么样的考生？为了能顺利通过这样的面试，考生是否需要参考诸如《脑筋急转弯三百题》之类的书籍？这样出位的题目

自然为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埋下了伏笔。此外，媒体不当的炒作也迎合了受众的猎奇心理。在不少网站上，充斥着网编对于各类火爆“神题”的详细盘点和评论。有些媒体“标题党”的做法更是将此类新闻并化成娱乐新闻。北大的一道题考察了对于生命在于运动和千年王八万年龟的理解，却被某网站冠以《搞不懂乌龟王八 你难进北大》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新闻标题只是选取了原题中刺激人眼的元素，与原题呈现出明显的偏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于教育的不信任感。众多的“标题党”，使得受众再一次陷入娱乐化的消费狂欢之中。

选拔既然是自主性的，那么就应当放手让高校去做，旁观者不宜多管闲事。面试关系到考生的前途，原本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均有“可圈可点”之处。

从“神题”面试来讲，试题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着实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试原本是一种考核学生综合能力的方式，以期为高校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象蚂蚁大战、成语这样的题目能考出什么样的水平？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题目是要选拔什么样的考生？为了能顺利通过这样的面试，考生是否需要参考诸如《脑筋急转弯三百题》之类的书籍？这样出位的题目

“用户驱动”是产业技术创新的关键环节

□ 余江

近日，交通运输部要求9个示范省市的相关车辆，3月底前80%以上安装北斗车载终端，6月1日后凡未按规定安装北斗导航的车辆，不予核发或审验道路运输证。这项措施公布后，引起媒体的关注和讨论。

交通运输部的新政策，意在从“需求拉动”的角度加快北斗导航系统的推广应用。如果说北斗导航的早期研发是“技术驱动”，那么北斗导航的推广应用就要强调“用户驱动”，重视用户需求，鼓励用户参与产品和服务创新。

作为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我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北斗系统的后续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作为导航系统产业化关键

的民用领域需要拓展，大众用户市场如何真正启动也需要认真思考，特别是要解决好市场终端应用服务滞后的问题。由于消费者熟悉度、品牌认同度以及替换国外的GPS系统存在的高转换成本等原因，启动价格敏感的北斗个人导航终端市场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我们过去的一些产业发展很重视技术研发和攻关，往往是技术和产品出来后才考虑市场应用问题，而不是一开始就把“用户需求”作为引领创新战略的基准目标，由此造成一些技术和产品在推广应用时遇到很大的困难，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成果难以实现市场价值，这往往导致创新过程困难重重。

“政产学研用”最终还是要落到“用”上。对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政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机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对于核心技术、基础设施等产业链上游，要强调充分利用政策扶持推动和政府需求拉动；对于设备、部件、基础产品等产业链中游，最重要的是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主导作用；对于产品应用、系统集成与运营服务等产业链下游，需要强化用户驱动，重视政策对于市场渗透路径的指引作用。

由此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要推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平衡发展。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简单引导，而是要面向“用户需求”，与其他主体进行多类型、多层次、多角度、多环节地互动与协调。

直接驾考尚需制度“陪驾”

□ 王旭东

近日，公安部信访办公室就网友提问作出公开回应。公安部称允许公民直接考驾照，但学车应当使用教练车，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坐教练车。有网友质疑新规驾考通过率太低不合理，官方称将根据公众意见优化驾考。

公民直接驾考，相对于驾学员来讲，属于“自学”。自学不是“割学”，更不是“偷学”，它必须在实际操作中练就驾驶技能，因此，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学车过程是有一定道理的，主要是出于交通安全的考量。但是，“使用教练车”，以及“教练员随车指导”，几乎等于还要与驾校打交道，这不是让学车者“戴着镣铐跳舞”吗？

学车者驾考已开启“绿灯”。2007年，深圳市民崔彬因未上驾校申领驾照遭到拒收，并认为其驾照作出不予受理行政行为违法。当年8月30日，崔彬成为以自学名义申请驾照考试的中国第一人。这不是“一个人的胜利”，2012年12月17日，深

圳交警以“网上车管所”为平台，在广东省率先启用“自学中领驾照网上报名预约系统”——不用进驾校学习，也可以申请驾照考试，目前每个月的配额为500人。截至目前，包括深圳、南宁、呼和浩特等在内的一些城市已放开个人申请驾照考试。

只有彻底开放学车市场，才能撼动驾校捆绑驾照的利益格局。长期垄断驾考的驾校有资本、有动力在学车培训费上“做车”。就目前情况下，自学，算是才起步，属“稀有物品”，最多就是个“配角”，较之驾校来讲，不是一个级别的，尚未构成对驾校的威胁，更难以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官方的回应也只是“有条件的允许”，还存在着不少“技术障碍”与“制度障碍”。

直接驾考尚需制度“陪驾”。自学者如何保证在学车过程中不成为“马路杀手”？能否保证学习的质量？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棘手的问题。与其“教练员随车指导”，不如让配套制度随车“陪驾”。据学车者高洋表示，在私家车早已普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师傅带徒弟”等自学方式，到警察局自由申请驾照。我们又何必局限于教练车与教练员呢？相关配套制度要拓宽“教练车”、“教练员”的外延，让自学、学车更容易。

给“第三次工业革命”泼泼冷水

□ 吴中宝

杰里米·里夫金所著《第三次工业革命》一推出，就迅速受到媒体和理论界的追捧。笔者承认同时也赞同书中关于新能源变革、信息技术的变革，而不是革命和绿色工业的观点，但不认同“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窝蜂地鼓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做法泼泼冷水的时候了。

首先，里夫金所说的还不能称之为“革命”。工业革命（或者说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生产方式发生了能够被大范围推广的颠覆性革新。信息技术和能源技术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工业革命发生的两个导火线，因为生产方式的变化往往是以动力强度的变化和生指令传递效率的变

化为基础的。但如果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有效突破，就算不上工业革命，而只能成为科技革命或者能源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根本原因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促使生产所需的动力强度发生了质的飞跃，才使纺织产业的变化原因，这是不严谨的，至少把新闻媒体的出现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就很牵强——学习能力的运用不过是为了适应这种生产方式而已。当然，如果从

普遍联系的角度出发，也不能说不对，但至少这不是关键因素。

其次，分布式（分散式）技术才是里夫金所强调的关键，然而，短时间还难以达到颠覆批量生产方式的地步。信息技术促成了分布式理念的进一步发展。里夫金对能源革命的描述也是建立在反复强调分布式技术的基础上，本质上未见新意。分布式技术确实被看作是生产方式变革的一个重要力量，但目前看来，这只是批量生产方式的一个补充，因为所演化的模块化和生产外包制（丰田模式）只是生产方式的改良，严格说甚至只能算是商业模式的变化，还不能冲击现有生产方式。我也认为分布式理念是下

一次工业革命的突破口之一，但不能就此看